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 与新文化的登场

杨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 与新文化的登场

杨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杨早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8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ISBN 978-7-301-14122-9

I. 清… II. 杨… III. 文化史-北京市-1904~1919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837 号

书 名: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

著作责任者: 杨 早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122-9/G · 242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4.75 印张 256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总序

陈平原

美国学者 Richard Lehan 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 289 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

“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2008年7月2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目录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陈平原/1

导 论/1

第一节 作为“舆论环境”的北京/1

第二节 北京舆论环境在清末民初的变化/6

第三节 新文化的“登场”/10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布局/16

第一章 “眼光向下”：《京话日报》与启蒙运动/20

第一节 “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25

第二节 “以报纸推进社会运动”/33

第三节 “叫人人知道爱国”/44

第四节 京沪白话报比较：启蒙的不同路向/52

第二章 日本报纸在北京：《顺天时报》的启示/63

第一节 《顺天时报》的崛起/65

第二节 个案分析：报道方式与版面编排/77

第三节 启示：“介乎高级报纸与大众报纸之间”/90

第三章 民初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与集团重组/103

第一节 政党报纸：“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105

第二节 身份转型：“超然各党之间，主持一团舆论”/117

第三节 集团重组：新文化运动的源流/129

第四章 校园内外:新文化的登场/138

第一节 从启蒙到自启蒙/141

第二节 舆论参与与空间拓展/153

第三节 “崇新”与“重少”:文化的权势转移/162

第五章 五四前夕:新旧论争与多方博弈/177

第一节 “保存机关”的苦心/179

第二节 “新旧论争”的意义转换/188

第三节 舆论心态:政治抗争与文化立场/201

结 语/213

主要参考书目/219

后 记/227

导 论

作为“舆论环境”的北京
北京舆论环境在清末民初的变化
新文化的“登场”
基本思路与研究布局

第一节 作为“舆论环境”的北京

新闻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曾经指出：“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①公众舆论总是附丽于公共生活的，谈论北京的舆论环境，首先应当认识这座都城的公共生活。

自 1421 年(明永乐十九年)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 1928 年国

^① 李普曼著、阎克文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 14 页。

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这座城市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代前期满汉分居内外城,界限分明,城市公共生活的特征尚不明显。清末民初,满汉杂处已成常态,加之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当中的阶层区分极为显明。政府官吏、学校师生、报馆文人,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数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在新华门、东交民巷、中央公园、沙滩、吉祥戏园之外的另一重世界,很少出现在知识阶级的眼中和笔下。顾颉刚于1925年“发现”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会后,不禁感慨道:“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作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联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①北京与上海不同,北京从未成为上海那样国际化的商埠,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②因此,主要由外来知识分子构成的北京中上层社会的群体认同,与其说是针对着具体的城市“北京”,倒不如说是指向“首都”这个巨大的符号。

因此,同样由外来知识分子操持的北京舆论界,有着相当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除了清末启蒙运动中的特殊情形外,五四运动前的北京,还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能像欧美和日本的先进报业那样,从“政党报纸”发展成为“大众报纸”。当其时,英国第一份大众报纸《每日邮报》日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的《大阪朝日新闻》与《大阪每日新闻》的日发行量也已超过30万

① 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第26页。

② 施坚雅的研究表明,19世纪晚期北京的中心地位不是来自于人口众多和工商业发达,它仅仅是一个行政权力集中的首都:“北京的人口比人们对华北这个大都市预计的多不了多少;如果它构成全国一体化城市体系之巅的话,那它还不到原来该有的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参阅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

份,而北京大大小小的报纸近百家,日发行量却多则千份上下,少则一、二百张,发行量能够过万份的报纸仅《顺天时报》一家而已。这些报纸中,佼佼者也只能作为中上层社会的读物,下焉者难免成为钻营牟利的工具。

难怪历来的报刊史著,多认为这一时期北京舆论界在政府强权压制和政党利益驱使下,乏善可陈:“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闻自由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一度十分开放和活跃的社会公共领域大幅紧缩。内地报馆,虽前仆后继,时有增益,然而或者仰仗军阀所给之津贴,或者为报业禁令所震慑,其言论要么是偏于一隅,要么是模棱两可,了无生气。民意何在?舆情何所系之?这些在报纸上是看不到的。”^①在新闻史家眼中,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尤其是首都北京),几乎没有像样的大众报纸存在,更谈不上所谓的“公众舆论”。^②

讨论北京有没有所谓“公众舆论”,必须先对相关概念作出界定。在笔者看来,当我们定义和描述“舆论”、“公众舆论”、“舆论环境”时,不仅需要明确这些语词的普适意义,还必须将上述概念放置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才能为讨论“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提供一个合理的背景和可靠的前提。

对于“舆论”,较为权威的释义是:“通常指公众意见或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社会集合意识和社会知觉的外化。……舆论的本质是通过志愿的思想交融凝聚成的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该释义又称:“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舆论,指的正是民意。”^③从广义上说,“舆论”或“公众舆论”,指的都是“社会所有人意见的总和”,它是一种客观、自在的状态。“舆论环境”则不同,从字面上理解,“舆论环境”是各种舆论手段和舆论互动构成的社会场域,它呈现为

①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347页。

② 参看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黄河编著:《北京报刊史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③ 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第343页。

有着历史性和主体性的“文化场”^①。舆论环境的历史性,表现为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深受传播手段的制约,如在20世纪初,中国各地信息传递已能普遍使用电报,但北京与津沪之间的报纸运送存在着一至两天的时间差,限制了津沪两地报纸报道和影响北京社会的及时性。舆论环境的主体性,表现为不同的主体接收到不同的舆论信息,从中选择出与自己相关的信息,并对之作出反馈。另外,主体发送的舆论信息也有着影响的远近、深浅之别。

19世纪的欧洲舆论学家提出了对“公众舆论”的现代定义:“公众舆论指的是当民众属于同一社会群体时,他们对于某一问题的态度。”哈贝马斯指出,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将民众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同时将公众舆论的定义从“个人意见的总合”修正为“群体中的主导性意见”。^②有论者将“舆论”区分为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自发的公众舆论”与“自为的新闻舆论”,而将“新闻舆论”定义为“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③这实际上是区分了狭义的“公众舆论”和广义的“公众舆论”。一旦某种“社会意见”在媒体上发表,并被指认为“公众舆论”,它就有可能反过来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为公众提供“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④公众舆论之所以成为公众舆论,不在于不可见的“公众”会自动形成某种清晰的观点,而在于某种观点被信息机构和社会群体共同确认为主导性的意见,从而完成整个社会对“公众舆论”的想象。公众舆论的形成,实质是不同的观点使用各种舆论手段竞争取得社会多数人认同的过程。

尽管民初的北京舆论界有着浓厚的精英色彩,但这个以同人刊物、机关

① 此处借鉴布尔迪厄“文学场”的概念,以说明舆论环境的场域属性及其携带的“文化资本”。参见布尔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② 参阅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288—289页。

③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14页。

④ 参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叻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3),第35页。

报纸(少数带有大众报纸性质)组成的舆论环境,仍然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在一个上、中、下不同阶层共同构成的都市社会中,“下层民众参与”的缺席,自然会导致“个人意见的总合”出现部分缺失,但如将“公众舆论”看做“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那么这个悬浮在市民日常生活之上的中上层社会里,仍然存在着广义上的“公众舆论”。^①

而且,相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的其他城市,北京在舆论环境的扩展和多元化方面,有它自己的优势。首先,庚子事变之后,配合宪政风潮兴起与国族危机意识高涨,中国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展开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相当成功地培养了北京民众对报纸、演说等现代舆论手段的接受;其次,民元后的北京各报纸以政党、教会等为依傍,各为其主,众声喧哗,形成了相互冲突、竞争的舆论态势。到五四前夕,北京的报刊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各党各派、各种利益集团均拥有自己的言论机构,令多元化的言论空间成为可能;(二)主流报纸的企业化程度较高,受政治势力控制程度相对减弱;(三)清末白话启蒙传统的延续,使报刊对于北京民众的亲合力高于其他地区,连最“先进”的上海报界都为之惊叹。^②以地域而论,选择北京而非更为“进步”、“开放”的上海,除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随《新青年》北移的因素外,北京的舆论环境包含着更多的阶层话语与对立元素,从而扩大了公共话语的包容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本书以报纸和杂志为中心展开讨论,也是考虑到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的实际状况。虽然20世纪初的舆论手段包括了报刊、书籍、布告、演说、流言等众多形态,但在诸多媒介之中,报刊发挥的力量无疑是最大的。用余英时的话说,“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只有报章杂志”^③。按照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同是属于“印刷文字”,报纸较之书籍,有着更强的包容性,因为报纸

① 考虑到当时习用“公众舆论”一词,本书不再另采新词,而是有限制地使用“公众舆论”,尤其在需要与“精英言论”相区隔的场合。

② 《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7日。

③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198页。

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group confessional form)”，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① 选择报刊媒介来讨论舆论环境的建构，看重的是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群体参与性和言论多元化。

第二节 北京舆论环境在清末民初的变化

从庚子事变，到五四运动前夕，北京舆论环境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彭翼仲、杭辛斋为首的启蒙知识分子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并结合阅报所、讲报处、改良戏曲等一系列启蒙手段，初步形成了以下层社会启蒙为特色的北京舆论环境；第二次是由满清入民国之际，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北上入京，随之涌现大量新生的舆论机构，这一变动意味着北京热衷于下层启蒙的舆论传统，被精英议政的舆论形式取代，清末启蒙运动致力的上下层沟通重新被弃置，北京回到阶层界线分明的生活状态，舆论界的拟想读者也从普通民众上调到工商业者和学生群体；第三次是新文化兴起初期，北京舆论界在支持/反对这一运动的论争中分裂与重组，大致形成道德与文化方面持保守态度的旧派舆论与支持、提倡新文化新思潮的新派舆论两大阵营，但即使同一阵营中，具体报刊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仍然可能存在着歧异的取向。

讨论舆论环境的变化，不应仅仅关注报刊的生灭异动，纳入考察范围的对象，还应包括知识精英、公众舆论、政治背景、民众心态、地缘环境等等。

新式知识分子^②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群体性的自我反省与身份转型。清末的启蒙知识分子尚未完全摆脱“士”这一传统的科层定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官僚和报人之间的身份转换完全不存在障碍，实际映射出“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作为平衡力量。清末启蒙运动的参与

^① 参阅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256页。

^② 在本书中，“新式知识分子”、“知识精英”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等概念都指向同一群体，即清末民初受过西学浸染、有资格（革命经历、报业经验或留学背景）参与上层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的知识阶层。

者,大都携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呼吁“立宪”或要求“革命”。民国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威权的重建,造成了新式知识分子从政的压抑,反而迫使他们完成集体性的转向。史华慈指出:民元以后政治斗争的失利,使“高级知识分子”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于是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的建设,“认为只有改变意识才能推动社会”。因此,“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虽然仍有部分知识分子重新卷入政治生活,但就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立阶层的自我意识”。^①尤其是其中不少深具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由“政治家”向“舆论家”的转型,让知识分子群体获得了新的表达观点与参与政治的途径,并以文化立场而非政党背景为中心进行集团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方式。

作为独立阶层的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报刊等舆论工具,充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中介,从而实现西方式的舆论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他们设想中的舆论现代化进程,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描述的英法“公众舆论”的形成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如从“代表型公共领域”经由“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其实质即由知识阶层代表市民挑战国家权威,借此与国家权威“构成了一种平衡势力”,知识阶层通过集会和报刊等形式组织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舆论场,并试图养成以公众舆论为媒介的“政治公共领域”。从本书相关章节可以看到,在梁启超、章士钊等“舆论家”的想象中,政府、知识者与民众的关系应该类似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之前的描述:

政府当局向“这些”公众发布公告,一般是针对所有臣民的;但是,依靠这样一条途径,它们通常并不能到达“普通人”那里,最多只能到达“有教养的阶层”。随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即

^① 费正清主编、杨品尔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71—473页。

市民阶级，他们在“公众”范围内占据核心地位。他们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此外还有医生、牧师、军官和教授、“学者”等——他们处于最顶层，通过教师和撰稿人而和“民众”发生联系。^①

这种带有古典意味的舆论图景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完全实现，一方面是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北洋政府对舆论的摧残与压制，另一方面也与报刊商业化的世界潮流有关。戈公振对民初报界的评价是：“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产业所化。”^②“为官”和“为产业所化”都不符合新式知识分子对于“英美式自由主义”舆论的想象。但“为产业所化”是现代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戈公振也承认，民初报业发展较之晚清，最大的优势即在于民众已养成阅报的习惯。由于受众的变化，中国报纸也开始了由“高级报纸”向“大众报纸”的转型，即报纸的企业化现象渐趋严重，这种趋势使各大报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政治的压力，为离经叛道的思想提供言论空间。考量报纸的独立地位与传播效果，当然以企业化报纸为胜。张季鸾在回顾中国报业历程时指出，报纸的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故而才能成为社会上“一种大的力量”。^③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认为“报纸要走上企业化，必须基于以下的几个条件”：“在本身方面，要：资本雄厚，网罗专才。在客观方面要：所在地商业兴盛，交通发达，人口多，教育水准高，有言论自由。”^④具备这些条件的报纸，主要集中在京、沪、津三地，导致舆论资源向这三个城市集中，而作为首都的北京，必然吸引最多的媒体注意力，民元以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都纷纷在北京设特派通讯员，天津《益世报》甚至在北京开设分馆，出版

①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21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第161页。

③ 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季鸾文存》下册（天津：大公报馆，1946），第151页。

④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77），第335页。

北京《益世报》，说明北京的舆论环境不仅仅反映和影响北京一地的舆论动态。^①

随着自我反省的深入，知识分子看待的民众眼光也发生着变化。从晚清运用白话报纸、白话小说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到五四前夕白话文运动的大受关注，并非启蒙形式的简单重复，而是涉及知识分子启蒙理念的重新建构。胡适对此的解释是：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②

新文化运动不仅试图将知识用通俗的方式传递给下层民众，而且提出“重估一切价值”，颠覆既有的知识体系，它不但是一场面对民众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启蒙运动。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新文化运动激起守旧派极大的反感，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上层社会的“士大夫文化”的存在。

余英时指出，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1919年5月4日的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是靠什么社会力量支持的”。他引用陈独秀的话说明：“中国近

① 据陶菊隐回忆：“当时各大报根据地区的重要性和稿件质量的不同，将全国各地通讯员划分为若干等级：首都北京为第一等，驻京记者的地位儿与馆内主编相埒，天津次之，广州、汉口又次之。”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7页。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

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①通常被称为“学生社会”的边缘知识群体,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广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周策纵认为,两个因素导致学生群体成为社会运动的主力:一是清末科举的废除,使这一群体丧失了经由传统合法途径成为社会决策者的可能,只能通过让自己成为群众领导者来实现其自身价值:“像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立法机构和选举制度的国家里,他们看见逐渐的改进被阻碍,民意被抑制。这种情形使他们愤怒,也使他们认为他们的非正统式的政治行动的反抗和抗议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旧制度显得如此无望,趋新和现代主义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就增强了。而且,辛亥革命已把皇权推翻,至少已打破了旧政治的总框框,启示了革命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学生群体与政治决策者的代际差异,使两者的教育和观念呈现出如此的不同,导致学生与政府、学校的观点几乎无法沟通,而且,大多数对政府决策绝望的公众舆论也不反对学生干政,甚至代行“国会”的职能。^②

考察新文化的传播,北京的地缘环境和社会状况同样是无法忽略的因素。虽然新文化的策源地在上海,但它的发展壮大却是在北京完成的。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背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提供的人才资源及社会关注度,以及北京媒体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与批判,都直接影响到北京舆论环境的变化。而舆论环境的变化,反过来会推动和制约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三节 新文化的“登场”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中,对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彼此并无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198页。

② 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135—137页。另见陈平原:《余论:设议院与开学堂》,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